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彭远春

【内容摘要】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 566 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 6 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关键词: 农民工;身份认同;乡土记忆

【作者简介】 彭远春,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师。河南 信阳:464000

1 研究背景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的统购统销和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就业、社会福利、教育培训等一整套政策和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处于一种受压抑、被歧视的地位,农民对这一以国家权力为保证的制度性强加身份,毫无选择自由,只能被动认同和接受。改革开放以来,不论国家还是地方层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种种制度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民工群体得以形成和壮大,农民工身份认同亦历经着从被动接受逐渐向主动选择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从农民工主体视角探讨其对农民这一强加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影响因素,对农民市民化、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有着现实和政策的意义。

目前,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大多数研究立足于宏观层面和制度背景,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城市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项飙,2000;甘满堂,2001;孙立平,2003)。此外,有学者通过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将农民工区分为“明确定位为农民的回乡型、模糊定位的徘徊型、定位为市民的滞留型等三种类型”,指出“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社会歧视阻碍了滞留型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与身份认同”(朱力,2000)。有学者认为,“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国内劳动力移民浪潮,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城市的‘新移民’群体。这些新移民在一定意义上已构成了一个‘移民系统’,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分别受制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人力

本研究探讨的农民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即由户籍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一系列制度所赋予的强制性身份(peasant),这一社会身份是会被下一代所继承且具有先赋性的身份。

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只是其“外部特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角色群体的内涵上实现真正的转换;农民市民化是自我选择与政府选择共同作用、国家与农民互动的一种结果(文军,2004)。笔者认为农民市民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心理层面的转变即是否拒斥农民身份而接受和认可市民身份。

资本的影响”(文军, 2005)。至于从农民工主体角度考察其主观身份认同并不多见。王春光(2001)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社会记忆的互动视角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 揭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区分以及二者在身份、社区等认同上的差异, 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较第一代在身份认同等方面更具模糊性。王毅杰、高燕(2004)则从阶层认知的视角考察了影响流动农民身份意识的因素, 指出主观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中的位置, 感受到城市社会歧视、家庭对其外出务工经商的支持对其身份意识发挥着显著作用。

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表明, 现有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1) 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多立足于城市或研究者自身等“他者”的视角, 难以与农民工主体进行视角互易; (2) 侧重于从宏观制度视角研究农民工身份及身份认同。而在社会学的理解中, 制度作为一种规则的实践或者说实践的规则, 具有一种所谓的“结构二重性”(吉登斯, 1998), 这意味着制度的作用对象不是完全被动的承受者, 制度不是外在的制约结构, 而是内在于行动之中, 是制度实践过程中各方参与行动“结构化”的产物。故宏观制度视角研究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实践性, 对非制度影响因素探讨不足; (3) 忽略了农民工身份转换的时空背景, 未将“进城前- 进城后”、“乡村- 城市”之相应情境纳入分析范畴; (4) 现有研究主要采取逻辑分析和定性方法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加以研究, 定量研究稍显欠缺; (5) 当前有关农民工身份认同多夹杂于调查描述和宏观政策探讨之中, 研究缺乏系统性、专题性。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社会记忆和情境理论认为: 农民工进城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断续, 同时也发生着生活场域的继替, 不同时空情境对农民工有着深切的影响。正如彼得·布劳(1988)所说: “流动的人不能简单的抛弃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 但他们如果不接受新的角色属性, 不建立新的角色属性, 那么他们就不能适应他们的新位置。迁居到城市的农民, 其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地要受到他们农村背景和现在所处城市环境的双重影响”。故农民工身份认知不可避免地受到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和城市体验的影响(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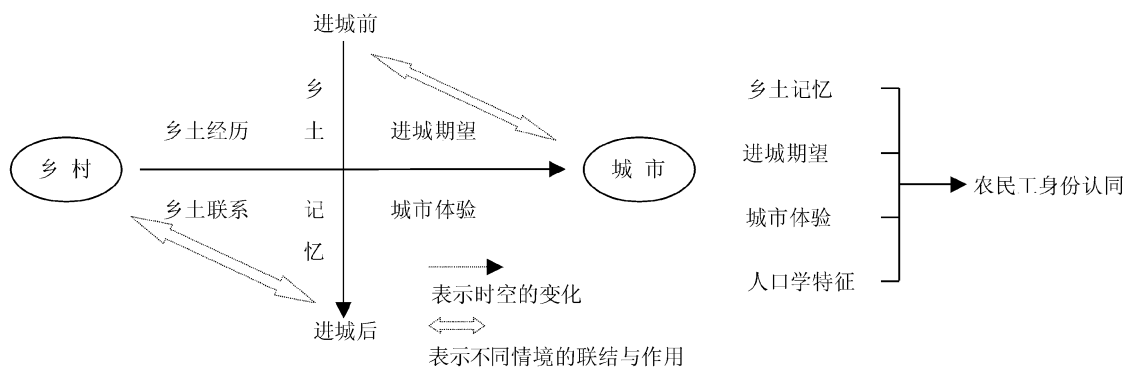


图1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图

在上述分析框架内, 本研究包括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三大类研究假设:

(1) 乡土记忆假设

与记忆不同的是一种属于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奇认为,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现实的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 或曰集体记忆, 即“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Halbwachs, 1952)。而威廉·詹姆斯将记忆分为“初级记忆”和“二次记忆”, 初级记忆是对刚刚被感觉和领悟的刺激存储, 而对这一刺激的有意识提取则由“带有选择和加工性

质”的二次记忆完成(James, 1890)。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在不同社会时空中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行动特点,这些都会在身体内沉淀和累积,从而给他们留下不同的社会记忆。而来自传统、习惯的各种积淀,以及他本人以前对意义的构造,这些都能记住和再度复活。也就是说,积淀于身体内部的记忆能被不断激活或提取,从而持续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由此,我们假定:农民工乡土记忆愈深,愈认同农民身份。

(2) 进城期望假设

农民工是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和制度所规定的行动者(项飏, 1996)。他们在外出流动之前,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已形成对城市的基本想象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就是说外出的动机和期望对农民工迁移、城市适应及未来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故进城之前,目标期望越明确的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3) 城市体验假设

情境理论认为,生活场域的变化,会对个人以及群体的行为、观念、认知等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对立的两极。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 and 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沃思, 1987)。即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形式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场所”(英克尔斯、史密斯, 1992)。而农民工作为城市里来自异乡的外来人,他们曾有过属于自己的行动构造和意义脉络,有过自己可理解的社会世界。但如今,面对城市生活这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面对这片他们把握不住,捉摸不透的真空,他们既感到惊愕又感到焦虑;既品尝着欢欣,又经历着痛苦(柯兰君、李汉林, 2001)。由此,农民工正向、良性的城市体验越多,越不认同农民身份;负面的城市体验越多,越认同农民身份。

2.2 研究设计

2.2.1 因变量及其测量

农民工身份认同指的是农民工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本研究通过对“虽然您的户口在农村,但是您现在却不在家乡务农了,那么您觉得您是不是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程度,选择“否”意味着完全不认同即摒弃农民身份,“说不清楚”意味着模糊认同农民身份,“是”意味着明确认同农民身份,三者间存在认同上的序列和等级。

2.2.2 自变量及其测量

乡土记忆指的是农民工在外务工前,在农村的生活、工作经历以及进城后与乡土的联系程度,即包括乡土经历、乡土联系两方面。而乡土经历包括务农时间、乡土工作项两方面。务农时间指的是研究对象教育中断或完成后,在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以多少个月计算。乡土工作项指的是研究对象外出流动之前,除务农活动外,在农村所从事过的职业种类。至于乡土联系,由于资料所限,仅考察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的程度。

进城期望指的是农民工在外务工前,对城市生活目标的规划,本研究主要通过居留意愿来反映。

城市体验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和主观感受。结合相关研究和本次调查实际,从职业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主观感受、社区友好度、消费状况、大众传媒接触程度等5个方面加以考察。在现代社会,职业是判别身份的主要标识。而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历经职业方面的最大变化,本研究主要考察其在城从事职业数和当前职业适应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即进城后在城市从事过的职业种数;而当前职业适应程度的测量,则通过选取餐饮业10个方面的工作内容,要求被访者从1分到10分对自己各项工作表现打分,然后对这10个方面的得分加权平均产生一个新变量,取值范围在10~100分之间。同时,马克斯·韦伯(1997)认为阶层地位主要通过财富、声望、权力三个标准

来衡量,结合农民工群体的实况,本研究主要通过月收入和其对月收入的评价即月收入满意度来测量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及主观感受。此外,本研究通过社区居民对农民工的友好程度分值(取值范围为1~10分)来反映社区友好度以及结合农民工实际,从农民工客观层面的月均消费数额以及对消费满意度的主观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其消费状况。最后,大众传媒接触程度指的是农民工对电视、广播、书报以及网络的接触程度,并依照“经常”、“偶尔”、“很少”、“从不”接触频率分别赋值为1、2、3、4分,通过4个方面的得分相加产生一个新变量,其取值范围在4~16分之间。其分值越低,则大众传媒接触程度越高;反之,分值越高,大众传媒接触程度越低。

2.2.3 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指的是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基本信息,常用作控制变量。为了与既有研究相比较,本研究亦引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4个变量。

通过重新编码、生成新的变量等,对以上变量进行相应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赋值与统计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身份认同	1= 否 2= 不清楚 3= 是	2.28	0.756
自变量	务农时间(月)	定距变量	36.54	54.627
	乡土工作项	定距变量	2.33	1.074
	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的程度	1= 非常支持 2= 比较支持 3= 一般 4= 不太支持 5= 不支持	2.69	1.034
	入城前居留意愿	1= 非常想 2= 比较想 3= 一般 4= 不太想 5= 基本不想	2.54	1.238
	在城从事职业数	定距变量	3.43	0.852
	当前职业适应程度	定距变量	86.59	12.438
	月收入	1= 300元以下 2= 300~500元 3= 501~700元 4= 701~900元 5= 900元以上	2.32	1.150
	月收入满意度	1= 非常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太满意 5= 很不满意	3.91	0.925
	社区友好度	定距变量	7.93	1.691
	月均消费	1= 100元以下 2= 100~300元 3= 301~500元 4= 501~700元 5= 700元以上	2.20	1.102
	消费满意度	1= 非常满意 2= 比较满意 3= 一般 4= 不太满意 5= 很不满意	3.75	1.327
	大众传媒接触程度	定距变量	8.64	2.265
控制变量	性别	1= 男性 0= 女性	0.35	0.476
	年龄	定距变量	23.84	6.649
	婚姻状况	1= 已婚 0= 未婚	0.33	0.471
	文化程度	1= 不识字或小学 2= 初中 3= 中专或高中 4= 大专及以上	2.18	0.629

2.2.4 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本次调查以武汉市武昌杨园社区所有在职且户籍在农村的餐饮

服务员为总体,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具体做法是:在杨园社区所辖的16个居委会里各抽取若干个餐馆,然后每个餐馆里抽取5~7名餐饮服务员,这样共抽取602名服务员构成本次调查的样本。调查采取当面访问法收集资料,实际调查问卷602份,有效问卷566份,有效回收率94.0%。其中男性占34.6%,女性占65.4%。年龄在20岁以下占34.6%,20~29岁占47.0%,30~39岁占12.7%,40岁及以上占5.7%。未婚者占66.9%,已婚者占33.1%。样本基本情况较为符合餐饮服务业年轻未婚女性占绝大多数这一职业特点。

3 数据与分析

3.1 农民工身份认同现状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具有二重性,或者说这一群体具有过渡性或边缘性。也就是说,尽管在城市人的眼光中,农民工仍是“乡下人”,但由于工作生活在城市中,这一群体往往既以农村人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城市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其结果是他们身处在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不过上述说法都是基于研究者、管理者等“他者”或者说从城市角度来看待的,而作为身份认同的主体,农民工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呢?他们是摒弃、模糊认同抑或是明确认同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18.6%的农民工完全不认同农民身份,35.3%的农民工在农民身份上存在模糊认同,而只有46.1%的农民工明确认同农民身份。摒弃和模糊认同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占半数以上(53.9%),超过明确认同农民身份7.8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明确认同农民身份的农民工虽然仍占多数,但已并不占绝大多数,对农民身份的模糊认同占较大比例即他们认识到自身所处的边缘地位,一小部分农民工已完全不认同农民身份。

3.2 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分析

由于因变量身份认同本身蕴含着等级和序列,再加之自变量中包含着诸多定类和定序变量,同时为了有效探讨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效果及共同效果,本研究采用最优尺度(Optimal Scaling)回归分析(见表2)。

表2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最优尺度回归结果

纳入模型的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标准误	检验值 F	显著水平	重要系数 Importance
务农时间	0.081	0.032	3.927	0.043	0.088
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	0.107	0.031	6.401	0.009	0.104
入城前居留意愿	0.163	0.031	16.013	0.000	0.268
在城从事职业数	-0.141	0.032	10.604	0.002	0.140
月收入满意度	0.118	0.031	7.585	0.004	0.139
大众传媒接触程度	0.143	0.032	11.548	0.000	0.198
调整后的 R ² = 0.098 F= 4.128 Sig= 0.000					

从表2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有6个变量:务农时间、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入城前居留意愿、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大众传媒接触程度。整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F为4.128,显著水平为0.000,说明回归模型从总体上看具有统计学意义。修正后的决定系数为0.098,说明纳入回归模型的入城前居留意愿等6个因素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上具有9.8%的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是标准的回归方法的扩展,它在分析过程中使用定量化的手段尽量地反应定类变量、定序变量的属性,避免了普通的回归方法对定类、定序变量随意编码所带来的分析障碍。

解释力。不可否认,还有相对重要的因素未纳入回归模型,这也是以后深入研究所应考虑和探究的。诚然,如郭志刚(2003)所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元回归确定系数值一般不是很高,故这一方法多用于进行分析,较少进行预测”,由此解释力相对较低并不影响对现有纳入模型因素的解释。

从纳入模型的自变量个数来看,乡土记忆假设3个变量中有两个纳入,而城市体验假设8个变量中有3个通过检验。这说明乡土记忆假设、进城期望假设以及城市体验假设在本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均得到了证实,而人口学特征因素在农民工身份认同方面则不具三解释效力。Importance值则进一步表明,各自变量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变量影响力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此外,通过对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相对效果考虑,贡献力(分别决定系数通过 B_x 与 R_{yx} 的乘积获得)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城市体验(5.10%)、进城期望(2.87%)、乡土记忆(2.01%)。这说明农民工的乡土记忆、进城期望以及城市体验对身份认同起着独自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我国台湾学者廖正宏(1985)、谢高桥(1981)等人对城乡迁移者研究结果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即“大部分迁移者是在乡村生活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部分的接受了都市特性,它是一种增加而非替代的过程”。而不同的是,城市体验而非乡土记忆或进城期望最大程度的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对此,现象学社会学认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由可以通过直接影响、改变的“操作区域”和“潜在触及区域”以及“不可直接触及区域”构成,其中操作区域占据着核心地位,给人以最确实的现实感;三者间的过渡或转化借助“跃迁”(Leap)来实现(杨善华,1999)。而农民工进城后,直接、现时的城市体验型塑着日常生活世界的操作区域,而过去时点的进城期望和乡土记忆则相应沉淀为日常生活世界的潜在触及区域和不可直接触及区域的一部分。因此,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作为农民工层化日常生活世界的“有限意义域”,分别占据着“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地位,直接或借助“跃迁”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独自而不同的作用。

3.2.1 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从表2的结果来看,乡土工作项没通过检验,而务农时间、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的程度对农民工身份认同有影响,这说明乡土记忆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务农时间越长,意味着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越丰富,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规则等的认同更坚定,如在乡土社会中,与他们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地缘关系的重视,而在地缘关系建立的同乡关系就是他们除血缘关系以外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于是,务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不仅在外出时依赖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网络,而且在城市中更倾向于依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封闭式社群”,从而在面对离开本土永久迁徙,身份置换等问题上,更易作出否定性的抉择;同时,务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会对土地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更多的将土地视为一种生存依赖和安全保障,以至在他们眼中,在城市奋斗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有家乡的家庭和土地作为生存的保障,不至于沦落到无法生存的地步。由此,土地既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化解了外出特别是失业时的社会风险,也是他们心有所牵,无法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的条件,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始终无法产生。可以这样认为,务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更多的将外出务工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换言之,没有或只有较短时间务农经历的农民工,记忆中较为缺失对土地的感悟与依恋,从而更易摆脱土地束缚,摒弃农民身份。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乡土工作项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并没有影响,对此可能的原因是,当前乡村与城市并不完全割裂或截然对立,乡村经济生活等方面或多或少的渗入城市精神,在农村从事非农化职业并不单纯的意味着乡土性或乡村记忆的增强。此外,家庭作为乡城联系的中介及其在农民工身份转换上的作用有意无意中被忽视。首先,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则更多地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

起,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的目的,并建立起外出家庭决策模型(杜鹰、白南生,1997)。即外出流动者将家庭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Rowland, 1994),正是家庭整体决策而非简单个人行为决定着农民是否外出及其未来归属。进一步地说,若家庭成员支持其外出务工,则成为将其推出农村社会的力量,进而在农民工外出流动过程中倾家之力提供重大支持,如帮助找工作、讨论重大事情、精神安慰等,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弱对乡村的依恋与联结,进而乡土记忆被埋藏于身体内部而不易且不愿被激活或提取,慢慢趋于淡忘,由此乡土记忆的影响日渐式微;若不支持则意味着最终期盼他们返回农村,家庭依旧是农民工与乡村联系的强力纽带,乡土记忆始终处于活跃状态,自觉与不自觉中常被激活与提取,进而影响甚至固化农民工原有的身份认知。

3.2.2 进城期望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从表2的结果来看,入城前居留意愿的重要系数最大,为0.268,说明它在纳入的因素中最为重要,标准回归系数亦排在影响因素的第一位,为0.163,进城期望假设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传统乡村的研究中,农民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被视为一个另类,通常被描述成传统、封闭、保守的群体象征符号,农民行为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但1960年代以来,农民非理性行为的观点为诸多学者所诟病和抛弃。如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便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Schultz, 1964)。而在我国,1980年代农民工外出流动之初,研究者和管理者多限于城市立场和二元结构思维限制,视其盲目和非理性外出而以“盲流”对待。随着流动的加速,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以及研究的深入,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同时,外出务工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并且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行动(黄平,1997)。进而有学者指出,农民工外出流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方面有着自身的考虑与权衡(文军,2001),即在外出成本、可能收益、潜在风险以及未来期盼与归属有着慎重地判断与规划。可见,农民工外出前的进城期望并非盲目的,而是源于对自身实际情况、未来规划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等的理性考虑,如本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外出前非常想居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占25%,比较想的占28.7%,一般的占20.5%,不太想的占19.0%,基本不想的占6.8%。而有着积极或明确居留意愿等进城期望的农民工,怀着超越祖辈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理想,蕴含着脱离农村、背离农民身份的潜在意图,从而他们会有意识的调适自身的观念和行为,协调与外界的联系,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消解、摆脱现有政策、制度等结构方面的制约,逐渐借助和扩展社会资源建构有助于达成自身目标的机制和体系。对他们而言,随着在城居留时间的延长,其交往、互动对象将主动从初级群体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城市居民,互动内容也将更为丰富和深刻;其生活空间亦将逐步从城乡结合部或集体工棚转向常态居住社区,与此同时他们获取、调动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得到增强,进而促使政府调整政策或完善相关制度,最终有助于身份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外出务工之前,抱有具体或积极进城期望的农民工,越有可能积极参与城市公共生活和采取行动改善现有结构以融入城市,从而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3.2.3 城市体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在纳入回归模型的诸因素中,城市体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达到0.143、-0.141、0.118。这也说明城市体验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对每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与城市的频繁接触、良性互动以及正向体验有助于其现代性的增长。英克尔斯(1992)曾经典地论述了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对人们现代性的影响,“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大的

现代性”。大卫·理斯曼(2002)亦认为,“由于大众传媒扮演信息消费导师的角色,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并合理解释传统喜好与政治风格的变化、断裂和发展”。实际上,由于大众传媒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同农村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使得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对农民工往往比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力更为强烈,它将现实城市生活与农村的过去、现实与未来情形置于农民工眼前,不可避免地给农民工带来惊愕与冲击,促发其思想、价值观念的改变,并说服其接受变迁和融入城市生活。同时,对冲破原先地缘限制的农民工来说,在城从事的不同职业不但使他们更多地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培育了冒险精神、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而且还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阅历及强化了他们的竞争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城市不同职业的体验“培养了他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并因此得以在他乡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培养了他们敏锐地观察、捕捉外部信息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多种谋生技能;扩大了他们的人生视野”(王春光,1996)。可谓竞争能力的增强以及现代性的增长,更易于对传统观念、与实际不相符的身份的背弃。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职业适应程度并不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某一时点的职业适应不足以反映历经的职业适应情形;另一方面与本研究对职业适应测量方式有关,实际上本研究测量的只是职业技能适应情况,而对与城市现代性有着更为密切的人际适应、心理适应等并未涵括在内,从而可能影响到研究结果,这也是日后深入探讨所应避免和注意的。

其次,本研究调查发现,月收入不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而月收入满意度则被纳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之中,这与王毅杰、高燕(2004)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结果分析基本一致:客观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其身份意识,真正发生影响的是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对自己地位的感知。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外出务工前的收入与在城务工的收入相差不显著,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如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61.4%的餐饮业农民工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收入在700元以下更是高达82.1%。农民工一直处于收入低的状态,产生了一定的承受力和忍耐性,因此客观、持续的低收入状态不足以催生农民工身份意识的变化。当然,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参照群体不可避免的由同质性较高的农民群体转向城市居民,原先“均等化、相差不大”的收入评价日益为“同工不同酬”、“收入差距悬殊”所取代,从而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而这种负面体验则易将城市居民与农民这两群体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可能回归自身所归属的群体即强化对固有农民身份的认同。

再则,诸多研究证实城市歧视强化了农民工身份意识(袁亚愚,1994;李强,1995;王毅杰、高燕,2004)。即部分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在农民工求职、生活、交往、教育、保障等方面的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对农民工群体人格的歧视,给他们以巨大的心理打击,使他们对市民与城市产生反感和排斥,转而强化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但本研究并未证实社区友好度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在城市中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各方面有着接触与联系,而仅与农民工生活与工作有着一定联系的社区(当前,城市社区并未将农民工纳入自身体系加以管理,且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程度低、社区归属感不强),其友好程度不足以抵消来自其他方面社会歧视的影响;另外,亦可能与单一的测量指标有关。

此外,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消费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中各群体的边界更多的是以消费方式来标示,正如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2001)所言,“在工业社会中,身份与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身份源于职业或专业。而在后工业社会中,身份越来越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构成个人认同的形成、创造、维护和管理的重要方面。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国是一断裂的社会,社会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城市已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而乡村依旧处于生活必需品消费时代(孙立平,2003)。也就是说,在消费上城乡成员隶属于相对分割的区间,即城市居民具有较大的消费空间,往往通过消费来标识地位或寻求身份区隔,而农民以及农民工则被限定在狭小的消费空间,以满足基本的

生存和生活需要,在他们身上,消费不具备区隔或认同身份的功能。这可能就是农民工身份认同在月均消费以及消费满意度上无显著差异的原因所在。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社会记忆理论、情境理论等为指导,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在“进城前-进城后”、“乡村-城市”的双重分析框架内,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 566 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明确认同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占微弱多数,摒弃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只占较少部分,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

从最优尺度回归的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 6 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乡土记忆假设、进城期望假设、城市体验假设在本研究中均很大程度上得到验证。且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而人口学特征因素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上则不具解释效力。

不可否认,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但依然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实背景和制度因素。故从政策层面而言,消除农民市民化障碍的关键是改革现有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取消户籍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利,使户籍簿只是作为居住地的一个证明。同时应该看到,“尽管正式制度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正式制度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诺思,1994)。实际上本研究亦证实了非制度层面因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见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并不意味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同时转化。因此,非制度因素的探讨有助于打破“制度决定论”和“同籍化”倾向,从而推进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探讨。

此外,从本研究结果看,人口学特征因素在农民工身份认同上是失效的。这与赵芳(2003)的研究较为一致,其立足于湖南省青玄村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并指出年龄、职务岗位、务工年限、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的身份认知并不相关。而王春光预设年龄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并将 25 岁以上和 25 以下的农民工区分为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在身份认同上更具模糊性。但本研究显然不支持依据单一年龄的代际区分,因为本研究中年龄实际上并不直接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可能只是通过其他因素而起间接影响的作用。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区分,但仅依据年龄进行代际区分是不太科学的,代际区分的标准有待深入研究。

最后,由于诸方面的原因,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和遗憾之处。第一,本研究的调查地点仅限于农民工聚集的中部城市武汉,没有涵括其他有代表性的城市;第二,调查对象的行业也锁定在餐饮服务业,其研究结果对农民工聚集的其它行业如建筑业是否适用亦需进一步的探究;第三,由于调查对象是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调查地也没有所有在岗人员的名单,所以调查的抽样方式并非严格地随机抽样,研究结果的推广性也会受到一定影响;第四,由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相关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在概念的操作化和指标选取上难以借鉴,而从时空转换背景和情境理论来研究农民工身份认同,这毕竟是一种新尝试,它仍然需要更缜密的理论论证和更多的经验研究来检验。比如本研究使用的测量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却比较单一、粗略,进而可能影响到研究结果与研究深度。在将来的研究中如何设计出更有效的测量指标,仍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21
- 2 安东尼·吉登斯,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9~92

- 3 彼得·布劳. 孙非, 张黎勤译.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华夏出版社, 1988
- 4 大卫·理斯曼. 王崑, 朱虹等译. 孤独的人群.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5 戴安娜·克兰. 赵国新译. 文化生产: 媒体与都市艺术. 译林出版社, 2001
- 6 道格拉斯·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三联书店, 1994
- 7 杜鹰, 白南生. 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 8 甘满堂. 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 福建大学学报, 2001; 4
- 9 郭志刚.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66
- 10 黄平主编. 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口的社会学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5~ 8
- 11 马克斯·韦伯. 林荣远译. 经济与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97: 246~ 249
- 12 柯兰君, 李汉林编.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4
- 13 李强. 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 社会学研究, 1995; 4
- 14 廖正宏. 人口迁移. 三民书局, 1985: 180
- 15 孙立平. 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5~ 38
- 16 王春光.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100~ 101
- 17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 社会学研究, 2001; 3
- 18 王毅杰, 高燕.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4; 2
- 19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 2001; 6
- 20 文军. 农民市民化: 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21 文军. 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 南京社会科学, 2005; 1
- 22 沃思. 城市与乡村. R·E·帕克, N·伯吉斯, R·D·麦肯齐. 孙立平等译. 城市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 1987
- 23 项飏. 流动、传统网络市场化与“非国家空间”. 战略与管理, 1996; 6
- 24 项飏.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三联书店, 2000
- 25 谢高桥. 都市人口迁移与社会适应—高雄个案研究. 巨流图书公司, 1981: 14
- 26 亚历山大·杰弗里. 贾春增等译. 社会学二十讲. 华夏出版社, 2000: 180
- 27 杨善华.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1
- 28 袁亚愚. 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 29 赵芳. “新生代”: 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以湖南省青玄村为例. 社会学研究, 2003; 6
- 30 朱力. 准市民的身份定位. 南京大学学报, 2000; 6
- 31 Maurice Halbwachs. 1952 Maurice Lescadres Sociaux de Lamem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32 Rowland, D. T. 1994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grants. PP. 129~ 253 I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Lincoln H. Day and Ma Xia. New York: sharpe.
- 33 William James. 1890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34 Schultz, J. W.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4~ 64

Factors Affecting Identity of the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Abstract: Drawing on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566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employed in catering in Central China's Wuhan 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identified with "peasanthood"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is. The survey shows that more than thirty percent of the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are equivocal on their identit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s that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identity include: attitude towards living in the city before migration, contact with the mass media, number of jobs done in the city, contentment with salar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families support their work in the city, and duration being engaged i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he results confirm to the hypotheses that countryside memory and urban expectation and experience have independent and strong influence on identity of the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Countryside memory

Author: Peng Yuanchun is Teache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Xinyang Normal College.